

【第三只眼】

“丢书大作战”为何遭质疑

□杜浩

从11月15日上午开始,一篇叫做《我准备了10000本书,丢在北上广地铁和你路过的地方》的帖子在朋友圈不停刷屏。这项由某媒体微信公众号发起的名为“丢书”的活动,是继前段时间的“图书漂流”活动之后又一图书阅读推广活动,演员黄晓明、徐静蕾、张天爱、张静初、董子健率先在北京、上海、广州的地铁、航班和顺风车里丢下贴有活动标志的书籍,并拍下照片,号召更多人参与阅读和分享……

这个“丢书”活动,缘起于两周前英国演员艾玛·沃森(电影《哈利·波特》中赫敏的扮演者)在伦敦的“地铁藏书”活动。“赫敏在伦敦地铁藏了100本书”在社交网络上很快成为热门话题,许多中国读者也对这个创意赞誉有加。某媒体微信公众号发起了中国版“丢书大作战”。他们称这次活动是“赫敏藏书”的升级版,除了1万本书和一长串明星、作家、媒体人的参与名单外,还开发了活动专属的网站与线上系统,读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了解每一本书被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丢下,又被谁捡到了。

然而,与“赫敏藏书”赢得一片叫好声不同,中国版的“丢书大作战”却迎来了国内网友的冷嘲热讽。一篇题为《捡一本书并不会改变你的生活》的文章说,“英国人是出了名的爱读书,读书量为世界之最。而面对中国读者,你能指望他会在这样的一个活动里去阅读诗歌、古典文学、世界名著吗?”还有人提出,“真正看书的人都在图书馆里趴着,网络书店里逛着,丢书的参与者未必是真正爱读书,只是在跟风,或刻意彰显自己的品位。”

活动主办方却认为,“丢书”契合了大城市年轻人的阅读需求,“这次‘丢书’活动选择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正是面向日常渴望和喜爱读书但又没有时间去选书的年轻人。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年轻人对阅读的渴望绝不仅限于流行书,而且,我们在选书上坚持一贯的标准,那就是‘有价值的阅读’。”

但是,看起来富有文化积极意义的“丢书”活动,为什么却遭到各方的质疑?

其一,阅读本是一种纯粹的、自由的精神活动,目前却变成了一种带有功利性目的的商业行为。为什么有的图书阅读推广活动被读者诟为商业秀、营销秀?就是因为其中有了商家营销机构的诉求,有了商业的利益介入,有的商家通过赞助图书活动进行商业宣传,有的植入了广告的影子,有的成了图书销售排行榜的推广活动,甚至有的图书作者借机推销自己的作品,阅读文化活动完全变了质、变了味……

其二,这次“丢书”活动采用时尚流行的方式,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力量,有众多演艺明星助阵,这的确有造势和形成氛围的作用,但是,活动会不会仅仅是一阵风?效果如何,影响几何?是不能不考虑的。

阅读需要的是一个良好的、安静的读书环境,需要一个人文气息浓厚的精神氛围,需要每个人拥有良好的文化心态。举办书籍推广行动本无可厚非,但从本质上说,阅读更是个体化、个性化的。读书是一种爱好和习惯,也是一种需要不断实践才不致荒废的技能,因此,培养良好的、持续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态度,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我们每个人把阅读看做一种自觉——心灵的自觉、精神的自觉,源自我们心头的“阅读热”才能出现。

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了利益、权位、名誉,演绎了一幅怪诞而真实、幽默而深邃的社会图景。小说的现代主义色彩,使其具备了超现实主义的哲学意味,李雪莲也像潘金莲、窦娥、“小白菜”等形象一样,在今天的中国成了个性鲜明的符号。

小说的结构也很有特点。第一章是《序言:那一年》,29岁的李雪莲闯入大会堂,首长意外参加这个省代表团讨论,随口讲了李雪莲的事情,省长便雷厉风行,把市长、县长、院长撤个精光。第二章是《序言:二十年后》,49岁的李雪莲本来不想上访但又被逼得不得不上访。第三章《正文:玩呢》只有10页,写的是被李雪莲拉下马的县长老史急着从北京回家,但买不到火车票,急中生智,在一张纸上写上“我要申冤”举到头顶,警察立即把他当成上访者遣送回了家。

“玩呢”,这是刘震云对人生的解构、对生活的解构、对李雪莲行为的解构。老史的“玩呢”,更凸显出李雪莲20年上访人生的荒诞、可笑、无奈。也许在刘震云看来,人生就是“玩呢”,不是被别人玩,就是玩别人,而李雪莲是在玩自己——玩自己,一点也不好玩。

小说中的人名也取得很好玩,法院的叫王公道、董宪法,苟正义、贾聪明,县长史为民,市长蔡富邦,副市长刁成信,省长储清廉……这样的名字和他们的行为一对照,讽刺的意味一目了然。小说被拍成电影的今天,二胎政策已经放开,这个时候再来看李雪莲的命运,更让人感慨人生的荒谬、虚空和无常。

到首都,闯进正在召开人代会的大会堂。虽然因此干部撤了一大批,但20年间,在官僚眼里,她就是一个难缠的老上访户、一个维稳的对象,想讨要到一句真话,想让人相信她真的放弃进京告状了,简直比登天还难。李雪莲所面对的外部世界,和K面对的城堡一样,近在咫尺,但遥不可及、冷漠强大,能动用一切社会资源,随时可以将胆敢挑战的人吞噬,随时可以将决定改弦更张、迈向新生活的人逼进死胡同。

我还想到陈源斌的中篇小说《万家诉讼》,这部小说因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而广为人知。李雪莲和秋菊一样,也是为讨个说法而将官司进行到底,不同的是,秋菊成功了,但成功以后的秋菊很失望,她并不想把村长送进牢房;李雪莲失败了,失败了的李雪莲陷入的是绝望。不可否认,《万家诉讼》是一部反映现实的好小说,但囿于纯粹的法制

宣传目的,立意稍显浅薄。而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展现了更为广阔丰富的社会现实,上访截访的怪圈,官员选拔和惩戒机制,官场运作机制等,通过李雪莲的告状,把普通市民和各级官员的命运

【文化论坛】

李雪莲:现实中国的符号

——读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

《我不是潘金莲》是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获得第8届茅盾文学奖后的作品,小说的情节很简单:李雪莲为了生二胎不被处罚,和丈夫秦玉河假离婚,谁知,弄假成真,秦玉河和别人结了婚。李雪莲便打官司要求证明原先的离婚是假的,再和秦玉河结婚,然后再离婚。然而,普天下的人都说李雪莲的离婚是真的,秦玉河又在公众场合说她是潘金莲,李雪莲便踏上了漫长的上访告状路,目的就是要摘掉“潘金莲”的帽子。李雪莲从29岁告到49岁,直到秦玉河意外车祸身亡,她才停止了告状。

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贝克特的荒诞戏剧《等待戈多》。李雪莲的上访告状就像流浪汉狄狄和戈戈等待的戈多,到后来,上访告状要达到什么目的并不重要,上访告状成了她生活的本身,是她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一旦秦玉河死亡,告状没了缘由,李雪莲就只好选择吊死在桃树上——当然,没死成。没死成的李雪莲能活下去吗?刘震云没写,但我想,她或许会换棵树继续上吊,或许能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就像等待戈多的人们,在生存的焦虑中,寻找着生命的所谓意义。

其次,我想到的是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李雪莲和那个土地测量员K多么相似,K受命赴城堡上任,但费尽心机,就是无法进入城堡,面对强大、冷漠、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K无可奈何;李雪莲要告状,从法官、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到法院院长、县长、市长,没有人能好好聆听,逼得她只好跑



□朱一卉

【观影笔记】

拍了部反战片 李安用东方文化思维

□韩浩月

借着英雄的故事,拍一部反英雄的电影,这是《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最核心的初衷。对于看多了美国战争片,对其宣扬的爱国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已经熟谙于心的观众来说,《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提供了一个反向的案例,在这部电影里没有英雄只有平民,对战争的描述,也是只有伤害没有胜利。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在美国的口碑不好,纽约首映后烂番茄新鲜度为36%,评分为4.3,除了“格局小”、“故事简单”的评价外,可能还和该片冒犯了美国主流价值观有关。美国民众对伊拉克战争的厌恶,来自于这场战争把他们拖进了泥淖当中无法自拔,但反对这场战争不等于否定英雄主义,更不等于承认民众也是推动战争成为既定事实的组成部分。现在李安揭下了那层反思的面纱,对政客与民众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种一个都不放过的态度,会让坐在影院里的诸多美国观众生出一一种不适感从头弥漫到脚。

反对英雄主义,就是反对战争——李安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拍战争片,这是罕见的逻辑,但李安确实用简单的故事证实了这个逻辑的合理与真实性。还属于青少年的林恩犯了错,作为免除惩罚的交换,他在父亲的运作下进入伊战部队,由于“在混乱中拥有冷静的头脑”这个特长,他在混战中英勇地去拯救队友“蘑菇”,“蘑菇”虽死,但拯救过程被记者遗落在战场的摄影机意外拍下,视频传到国

内后林恩成了美国英雄。

林恩成为英雄是快速而意外的,而李安帮助林恩扒下英雄外衣则是沉着而缓慢的。在林恩回家、参加橄榄球比赛中场秀以及战争现场回忆这三个场景间,李安不断转换镜头,把一名“英雄”的无奈与悲伤之路呈现在银幕之上。好莱坞制片人喋喋不休地想要为林恩所在的B班签约一部电影,打算投资电影的橄榄球队老板只肯用聊胜于无的报酬来换取B班的故事,看台席上的观众有的

向B班送来套路化的敬意,有的则出言不逊……如果说B班在退场时遭遇暴徒袭击还不足以把队员们赶回战场的话,那么,与林恩有过亲昵关系且燃起林恩想要退役的愿望的美貌拉拉队员则用不容置疑的语气与眼神把林恩决绝地推向战场,继续扮演“美国英雄”。

电影通过对比的方式不断地讽刺美国人对“英雄”的态度,一面是通过夸张、豪华的中场秀,用电视来制造并传播“英雄”的存在必要性,另一面则是无情地对待“英雄”,冷漠地把“英雄”当成满足虚荣的工具,用完之后一脚踢开。这一点在堪称重头戏之一的中场秀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整场表演按部就班地进行,观众在电视前看到的是震撼的演出,而李安的镜头却直白地告诉大家,这是一场机械的操作,幕后是忙乱的编排,在战场上机敏的战士到了演出活动中却变成了任人指使的傻瓜……在经历了这一番折腾后,B班战士达成了统一认识,和现实社会的荒诞相比,战场是规则至上的,不按规则来,就会死亡,因此B班战士才发出了“只有在战场上才是安全的”这样的叹息。

电影在中国打分较高,达到了8.5分,是有着一定的文化背景原因的,李安在电影中表现出了他特别东方化的一面,即对普通个体生存的同情与怜悯,对个体命运卷入历史洪流无力挣脱的悲伤与愤怒。李安在片中始终克制着情绪,被形容为拥有

鸽子眼神的他,内心其实有着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深渊,他通过电影把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与不安颤抖着捧了出来,这种颤抖可以在饰演林恩的演员乔·阿尔文那张年轻的脸上一览无余。在拍《少年派》的时候就有人认为,派是李安的情绪代言人,《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的林恩又何尝不是?李安能够拍摄那么多电影而不显得重复,正是因为他始终在挖掘和探索自己的内心,他的创作原始力量,来自于灵魂深处的悸动,他的电影好看,恰恰是因为他擅长把自己的真实内心良好地刻画于银幕之上。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讨论的元素有许多,涉及家庭内部矛盾,亲情的珍贵与疏离,死亡与信仰的联系,金钱至上带来的庸俗等等,但李安在影片中融入这些,只是试图拓展电影的表达边界,只有一点是他想在这部电影中重点讲述的,就是反对任何名义的战争。李安在这部电影中传递的战争价值观,是不分正义与非正义的,他只批判战争的残忍一面,对所谓赢家与输家,并无立场。

可以这样确定,《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反战电影,只是它的反战思维不是过去时的,而是当下的未被知觉的,甚至是建立于未来人们对战争的整体态度之上的。尽管在观赏性上面有所不足,但它肯定不是一部平庸之作,如果真正懂得李安,就会明白他在这部电影中说些什么。